

历史思考 与理论探索

(上)

钟康模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历史思考 与理论探索

(上)

钟康模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思考与理论探索 (上、下) / 钟康模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4

ISBN 7-218-05112-X

I . 历… II . 钟… III . 社会科学—文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9173 号

责任编辑	王 宁 钱 进
装帧设计	林小玲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东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40.75
插 页	3
字 数	107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8-05112-X/C·133
定 价	53.00 元 (上、下册)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http://www.gdpph.com>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020-83799710(直销) 83790667 83780104(分销)】



钟康模教授，男，1949年生，广东蕉岭县人，中共党员。高中毕业后碰上史无前例的“文革”。虽蹉跎岁月，却仍刻苦自励。1978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旋又攻读中外关系专业研究生，1985年获硕士学位后分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工作，教学科研均有建树。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副校长（院）长、南方经贸学院党委书记、院长，现任广东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是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广东省劳动模范，广东省跨世纪宣传思想战线优秀人才。

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和中国当代，中外关系、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

1987年以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红旗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教材20余部，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136篇，论著合共560多万字，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

目录

上

关于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的几个问题	1
略论黄琪翔	9
略论杨度	28
曾纪泽——近代中国出色的外交家	47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	53
张之洞的清议及其作用	60
论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的转化	75
论张之洞对待外敌人侵的态度	110
论张之洞兴办洋务事业中的“抵洋”思想及其实践	127
论张之洞在中法战争期间抵御外侮的思想及实践	140
张之洞在督粤期间经办港澳事务的立场和谋略	150
张之洞在中俄交收东三省谈判期间的言行评析	160
张之洞与洋务运动	170
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张之洞	191
张之洞与“东南互保”	
——兼论张之洞对外态度变化的原因	210
张之洞在《辛丑条约》开议前后的言行评析	242
再论张之洞在《辛丑条约》开议前后的对外态度	251

张之洞在维新变法运动中的趋新与恋旧	266
张之洞在晚清教育近代化中的作用	312
洪仁玕和《资政新篇》略论	334
简评康有为的政治思想	345
关于梁启超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评析	355
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论评	376
章太炎政治思想述评	394
黄兴政治思想述评	420
吴虞反儒思想分析	442
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	462
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及启示	475
农民战争的命运和农民的局限性	
——太平天国及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	484
中国近代化运动的夭折	
——从洋务派的“自强”“求富”到维新派的“变政”	
“变法”	498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论评	512
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	527
再论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思想和实践	
——兼与台湾学者李云汉先生商榷	541
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兼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554
略论孙中山与国民党	595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思想及其作用	612

下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627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正面战场述评	641
关于抗日战争若干问题的研究与思索	677
论毛泽东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历史性贡献	737
相忍为国 力挽狂澜	
——毛泽东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后的运筹决策	758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反腐倡廉的思考和实践	768
毛泽东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775
毛泽东在公社化运动中纠“左”的努力及作用	792
论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思想矛盾及变化	811
“毛泽东热”的理论思考	830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858
人民的历史、共和国的历史不容轻率否定	
——“社会主义乌托邦”驳论	867
正确对待党在工作中的失误	876
邓小平在正确评价毛泽东问题上的思索与智慧	893
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贡献	912
论邓小平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	926
论领导干部带头学好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	955

毫不动摇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973
胡耀邦与真理标准大讨论	999
论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的 胆识和贡献	1034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弘扬为人民服务精神	1050
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074
关于商品经济与党风建设的关系	1101
中国共产党 85 年的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	1109
苏共亡党的原因和历史教训	1145
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光辉篇章	
——学习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1170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述评	1195
重温西柏坡 牢记“两个务必”	1214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专题报告	1230
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的历史思考	1259
后 记	1298

关于近代历史人物研究 和评价的几个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史学界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作了大量拨乱反正工作，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过去被当作禁区或半禁区的近代史（包括革命史）人物研究有了长足进展，出现很多历史人物传记和专集，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然而，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是个颇为复杂的问题，由于多种原因，研究近代史人物则显得更为困难和复杂。如何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讨的问题。本文拟就近代历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必须坚持唯物论。历史作为一门科学，是建立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的。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当然，评价历史人物，不同的阶级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就其作者来说，不同的生活阅历，不同程度的文化和思想修养以及不同的生活观、历史观，也往往会对同一历史人物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但不管你从什么角度去评价历史人物，总得有个依据。依据是什么？这就是史实。如果连史实都不顾，连资料都不去搜集，随心所欲，强作“无米之炊”；抑或信手拈来，不辨真伪，任意曲解历史，其结果

只能是颠倒是非，肢解历史人物，造成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一方面肯定了孙先生不朽的历史功绩，指出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另一方面又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苛求于前人的”。在这里，毛泽东为我们提供了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光辉范例。我们在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一定要从历史条件出发，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善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是说，既要注意纵的历史联系，又要注意横的社会关系，离开历史的发展或离开时代的条件和特点去研究，都是得不出正确的结论的。例如陈嘉庚，他是著名的爱国华侨，一生对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誉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但陈嘉庚在认识中国共产党以前却真心拥护蒋介石，拥护南京政府，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假赤化”的“共匪”，充其量是项羽、陈友谅式的“乱世英雄”，“无法统一中国”（《陈嘉庚致集美学校董先生函》，1933年5月8日，集美学校校委会藏）。基于这样的认识，陈嘉庚曾一度做了些违反时代潮流的错事。直到1940年，他冲破蒋介石国民党的阻拦，到延安深入调查考察后，亲眼看到共产党人的所作所为，才深知自己以前受骗太深，欣感中国的光明是在延安。从此，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由拥护到怀疑，由怀疑到反对，而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并一直同党和衷共济，长期合作，做了许多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对于陈嘉庚，我们党从来没有纠缠过他前期由于条件限制而导致的错误举动，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历史是一个社会关系的大总合，任何个人都是历史的产物，个人既影响着历史，也受着历史条件的制约。评价历史人物，必须用辩证的方法，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和研究。

历史是发展的、变化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和思想也会有发展变化，因此评价历史人物还应从发展的观点给予如实的评论，既不能苛求前人，又要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性。在这方面，近代的杨度颇具代表性。杨度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起伏变化较大的复杂人物。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旧的政治营垒里活动，曾和封建官僚、军阀沆瀣一气，政治上日益落后，最后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主要策划者，堕入反动派的泥潭。然而，社会在变，人也在变。杨度在反动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经过长时期的观察思索，至晚年幡然悔悟，服膺真理，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不计个人安危，毁家纾难，营救革命同志，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所以，杨度作为恶始善终、晚节可风典型，在历史上理应给予足够的肯定。我们不能因为他前期的落后和反动而否定他后期的进步。

(二)

客观的人，历史的人，是容不得溢美和打扮的。正如美国的惠特曼所说：“有一天你会替我作传记，你要说老实话。无论你怎样写，可是不要替我打扮，我的胡言乱语都要放进去。——我恨许多传记，因为它们是不真实的。我们许多的伟人，都被他们写坏了。上帝造人，但是传记家偏要替上帝修改，这里添一点，那里补一点，再添再补，一直等着大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了。”这段话说得好：要真实，不要打扮过的虚伪。然而，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在对正面人物的评述上，尤其是评价农民起义领袖时，常常无限制地修饰拔高，随意渲染。近年来，随着实事求是学风的恢复和学术空气的活跃，对农民起义领袖任意打扮的状况有所改变。比如在评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洪秀全时，就

比较注意采取分析的态度，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对于他身上反映出来的小生产的局限性也能进行具体分析，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可是，勿庸讳言，在近代某些领袖人物的研究和评论中，仍有拔高的现象。目前国内外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人很多，仅发表的论文就有一万多篇，足见这个伟人在世界上的深远影响。孙中山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热爱祖国，坚持革命立场，为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不屈不挠奋斗一生，开创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对孙中山在历史上建树的丰功伟绩，后人怀有崇高的敬意，深切怀念，永志不忘。但是也应看到，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他那个阶级、那个时代的局限。他坚韧不拔，英勇斗争，想拯救人民于水火，可是他在斗争中又往往脱离民众，这是他革命斗争屡遭挫败的重要原因。在革命实践中，孙中山改组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必须甘愿服从文一人”，并采取对天发誓和按指模的形式以昭郑重。这种以服从个人，依靠感情联系来统一全党的“人治”建党原则，实际上是接受了秘密会党的封建家长式的做法，因而产生了消极的后果。许多文章和传记宣扬孙中山一贯正确，洞察一切，是有点绝对化了，我们决不能苛求前人，但总是应该根据史实进行分析，力求客观些、全面些。当然，作为一般宣传和纪念文章可以不谈这些；但作为科学的研究，写人物传记，对他的局限性舍而不谈就不够全面了。

类似的情况在对李大钊的评述上也有所反映。李大钊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最后壮烈牺牲于敌人的绞刑架下。对他的功绩我们理应在史册上大书特书，热情讴歌。但也要看到，在当时他毕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多，认识也不够全面。他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就是在五四运动后，他还曾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相提并论。由于他还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

点去正确分析中国社会和各种政治力量，对胡适等提出的“好政府主义”还缺乏认识，1922年5月，他联名蔡元培、胡适等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宣言，无疑是个政治性错误。在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李大钊有这种那种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歌颂李大钊的同时，指出他的不足，丝毫无损于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的光辉形象。而溢美的评论，必然会使失去历史的真实，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对历史人物溢美，也不能对历史人物苛求。可是，在评价近代人物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用今人的政治觉悟去苛求前人，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的倾向。如对“金田起义志倾清室，天国告成位列北王”的韦昌辉，因为其在天京事变中犯了严重错误，就笼统地说他是投机革命的阶级异已分子。韦昌辉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毁家纾难，与反动地主应有区别。他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在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上，与洪秀全、杨秀清并没有根本的分歧。直到天京事变前，韦昌辉一直是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对太平天国有过重大贡献。说他投机革命，缺乏根据，也不公平。天京事变中韦昌辉扩大事态，惨杀无辜，负有严重的责任；但据时人记载，韦昌辉是奉洪秀全的诏命杀杨秀清的，洪秀全难道就没有责任？对韦昌辉的评价，不能乱贴阶级标签，搞唯成分论。同样，在评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石达开时，也存在这种情况。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有名战将，作战英勇，屡建奇功，清军闻风丧胆。天京事变后，他因洪秀全的逼迫，忍痛率部离京，辗转征战，最后在四川安顺场被敌人围困，走投无路，带着他五岁的儿子到敌营投降，想以个人的牺牲保全全军将士的性命。在赴清营之前，他先让妻儿七人投河自尽，这是很悲壮的。简单地给他扣上叛变投敌的帽子，显然不公允。

需要指出，用现代人的标准苛求古人的做法，与过去极左思潮影响下提出的“历史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相关。在“四人帮”肆虐的日子里，历史为政治服务，就可以任意践踏历史，篡改历史，使历史成了政治的附庸。为了“批孔”，于是乎孔夫子便去镇压柳下跖；为了“评法批儒”的需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竟成了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事情；为了民族大团结，王昭君能高瞻远瞩，高高兴兴地出塞和匈奴呼韩邪成亲。可见，为了政治需要，千方百计使古人来附合现实，给历史人物赋予现代人的意识的倾向，泛滥下去将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和严重的后果。

(三)

历史是复杂的、多层次的综合体。历史的复杂性造就了许多历史人物复杂的政治品格，他们往往把正确与错误，进步与反动集于一身，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对于这些人物，用简单的、笼统的评价方法，片面地肯定或否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用好人、坏人的概念作定论，显然是不科学的。应该把他们放到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之中，对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作全面的具体的分析，不仅看他们在历史上的一时一事，还要看他们在历史上的全过程。

如近代中国后期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他为官四十多年，对于晚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方面均有较大影响。纵观其一生，当外敌人侵，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刻，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都能以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投入反投降、反侵略的斗争，把其捍卫主权、扶危御侮的爱国立场显现在其经历过的若干重大涉外事件和对外战争中。但是张之洞的阶级本性又决定了他敌视人民革命，如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力主痛剿义和团，镇压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甚至在庚子年间勾结英国，

演出“东南互保”丑剧。以往论者，据此把他斥为叛国分子，否定他的一切，这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在晚清的封建官僚中，张之洞是比较具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的人。我们不应因他曾策划“东南互保”和镇压人民起义而否定他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爱国表现，抹煞他在近代文化教育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样，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应坚持一分为二。左宗棠进军西北，平定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必须肯定的；但他镇压太平天国及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的罪迹却是无法原谅的。我们不能因为左宗棠抗击侵略、收复新疆有功而肯定他的一切，也不能因他镇压农民起义而无视其历史功绩。

又如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前期呼吁救亡图存，领导戊戌维新变法，抱着振兴中华、变法图强的一腔热血，力图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后来却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反对革命，力主保皇，政治上日趋反动，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对于他们，指出其落伍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否定他们在历史上曾起过的巨大作用。

再如大家所熟悉的历史人物陈独秀，早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在黑暗的旧中国举起民主和科学的两面大旗，积极参与和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被时人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尔后，他和李大钊等奋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上海建立起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又在组建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小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独秀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在推动中国历史前进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他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滋长和发展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使革命惨遭失败。后来，陈独秀日益沉沦，又蜕变为托洛茨基主义者，成为中国各托派组织的总首领。我们在深刻认识陈独秀严重错误的同时，应

该看到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爱国运动时期、建党时期以及第一次大革命前期、中期的巨大功绩，不能只强调一面而否认另一面。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诸如上述这些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应该结合实际，考察个人活动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特点，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这样，才能接近历史人物的真实，剖示历史内在的客观规律。

略论黄琪翔

黄琪翔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军事家和爱国将领，后来又是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他一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在国民党的军营所度过的戎马倥偬生涯中，他既有辉煌的战绩，也有错误的举动，对国民党蒋介石，由拥护到怀疑到反对，最后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与共产党和衷共济，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对他走过的道路，特别是功过是非作一简略述评，无疑是必要的。

一、东征北伐参加民主革命

黄琪翔，字御行，广东梅县水车木莲塘村人，生于1898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历代务农，他早年读私塾。后进入梅县务本学堂、广州优级师范附中学习。1912年至1918年，先后由广东陆军小学毕业，升入湖北第三陆军中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炮兵科学习。保定毕业后，被派任北洋边防军第一师炮团第三营排长，1920年调任保定军校任炮兵团队长。

1922年，黄琪翔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辞去军校职务，南下广东，追随孙中山参加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黄在两次东征和平定滇桂军及讨伐邓木殷叛军的南征过程中，英勇奋战，显示出出色的军事才能。

第一次东征时，黄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三营营长，东征军分路出击时，蒋介石所指挥的黄埔军校教导团追至鲤湖、棉湖一带，受到陈炯明所属林虎部的猛烈抵抗，遂调陈铭枢第一师